《傳播與社會學刊》，(總) 第四期 (2007) : 75–102

中國大陸另類媒介的生產：以《朋友通信》為例

曹 晉

摘 要

本文通過對中國大陸同性戀者健康干預項目 ——《朋友通信》的民族志研究，展示兩個議題：其一，以《朋友通信》為另類媒介的經典個案，分析其編輯生產與流通模式如何實踐多種文化主義的平等理念，洞察另類媒介在中國的具體運作；其二，《朋友通信》開創了同性戀社群的媒介再現，本文借此探討中國弱勢群體的公共領域的建構問題。這兩個議題也是對批判傳播研究的理論擴展進行當代反思。

關鍵詞：另類媒介、多種文化主義、《朋友通信》、同性戀社群、公共領域

曹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國際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副研究員，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批判傳播理論、媒介與社會性別研究、書刊出版。電郵：fudancaojin@sina.co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2007)

The Production of an Alternative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 A Case Study of the Journal *Friend Exchange*

CAO J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wo issues through studying the *Friend Exchange*, a journal that features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Health Prevention Project for Homosexuals in Mainland China. First, the article will profile the Journal as a classical case, illuminating how its editing and circulating model concretizes the conception of equality within a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examin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an alternative media in China. Second, the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how the *Friend Exchange* creatively constructs a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mosexual community. By doing this, the article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issue of public sphere construction for the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s extended contemporary critiques, these two subjects also help to highlight the expansion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words: alternative media, multiculturalism, *Friend Exchange*, homosexual community, public sphere

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在經濟、文化與學術的全球化整合語境中，一方面，全球媒介組織的徹底集中化、商業化、私人化與去管制化，對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瞭解公眾問題與有效實施民主已經構成了威脅 (Herman & McChesney, 1997)。大眾媒介機構以爭取主流受眾和廣告商為課業，其媒介產品因全面追逐經濟利益而背離民主原則，窄化了公共領域的空間，扭曲了弱勢群體的形象再現。另一方面，1990年代興起了多種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的理論 (有別於優勢階層合法化其利益假定的自由主義的多元論 —— pluralism)，其為同性戀團體、婦女以及少數族群等弱勢群體進行社會抗爭提供了新的鬥爭力量。弱勢族群與社群憑藉自己生產的「另類媒介」，爭取社會參與的平等地位，並力爭差異的權益保障，以及維護其文化認同，從而實踐多種文化主義的社會平等理念。

中國大陸也不能置身上述語境之外。1980年代中後期浮出水面的同性戀議題，在1992年李銀河與王小波所著《他們的世界》出版後，交織著公眾與隱秘的軌跡引起中國大陸更多可見性的討論。青島大學醫學院張北川教授一手創辦的，作為健康干預項目的內部交流雜誌《朋友通信》(雙月刊，以下簡稱《朋友》) 是中國大陸另類媒介 (alternative media) 的經典個案，這份正面服務於同性戀亞文化社群的媒介產品直接聯繫著中國近10萬同性戀受眾，持續獲得福特基金會資助，從1998年到現在累積讀者已經超過100萬。[1] 張北川開創此項目的宗旨就是在有效防治愛滋病的同時，尊重與包容同性戀社群的差異，維護同性戀者的文化認同，給予同性戀者以平等的參與機會和權利，實現真正的社會正義。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美籍韓裔學者崔京姬 (Kyung-Hee Choi) 在2003年6月昆明舉辦的「遏制男男性接觸者愛滋病流行研討會」上，專門提及其在大陸問卷調查中得到《朋友》受眾資訊的資料 —— 被調查者中有「49%的人讀過《朋友》，其中89%的人喜歡並希望繼續閱讀《朋友》」。在筆者對成都與昆明的同性戀關愛組織與同性戀熱線電話的抽樣調查中，都有被訪談者受益於《朋友》的記錄 (曹晉、曹茂，2007)。目前，美國有兩個機構收藏《朋友》，其一是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其二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學圖書館期刊藏本中心。

就研究問題而言，筆者期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兩個議題：其一，以《朋友》為另類媒介的經典個案，分析其編輯生產與流通模式如何實踐多種文化主義的平等理念，洞察另類媒介在中國的具體運作；其二，《朋友》開創了同性戀社群的媒介再現，本文借此探討中國弱勢群體的公共領域的建構問題。這兩個議題也是對批判傳播研究的理論擴展進行當代反思。

從研究方法來說，首先是樣本的定量分析，對抽取的34本《朋友》進行有系統、客觀及量化敘述的內容分析，這是透過分類與統計來分析研究物件，《朋友》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資料彙集中演繹出來，研究結果因可測量的實證基礎被看成客觀標準，但這一方法只能說明《朋友通信》的表像，卻不能檢視內容背後的深刻社會意涵，而且還忽略了同性戀社群受壓制的痛苦體驗和豐富情感。所以，必須借助質的研究去揭示表像背後的《朋友通信》與同性戀社群生存的社會情境，故運用「民族志」(ethnography) 方法，親臨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性健康中心張北川教授的辦公室 (也是《朋友》的編輯部) ，進行實地觀察與深入訪談，在張北川的協助之下，與《朋友》的讀者、志願者 (他們是同性戀者) 和諧交流。同時，又訪問上海、成都、昆明的部分同性戀讀者，傾聽他們對《朋友》的收訊 (reception) 反饋。本研究放棄了問卷調查，因為有同性戀朋友告訴我，他們對問卷比較敏感，並且懷有戒心，學者們對此議題的熱衷所產生的「研究疲乏症」(research fatigue) 也使問卷調查的方法不太可行，反而會損害筆者與同性戀朋友的信任關係。最後，根據米爾斯和胡柏曼 (Miles & Huberman, 1984) 所強調的 ——「參與者的資訊反饋是熟悉研究場景和推論相關性的途徑」(van Zoonen, 1994：146) 的論點，筆者在本文初稿完成之後，為進一步提升研究的內在品質，聽取了參與者的反饋結果，研究物件的珍貴見解對論文的修正甚有助益，參與者再次閱讀最終的論文定稿，高度認同本文的研究觀點與結論，認為筆者的詮釋和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理解相契合。

文獻綜述

從宏觀來講，英美學術界對另類媒介 (Alternative media) 的研究已經

形成共識 —— 學者們一致認為另類媒介乃自由和民主抗爭的利器。從對另類媒介的具體運作的研究來講，至少包括三個關鍵要素 ——「技能」、「資本化」與「控制」(Williams, 1980：54)。在另類媒介組織工作的人士沒有把自己看成專業人員，而是行動主義者，其興趣在於「探索權力和不平等的根源，而不是報導『硬新聞』」(Curran & Seaton, 1997：15)。從形式來說，羅傑．西沃斯通 (Roger Silverstone) 認為另類媒介借用了大眾傳媒的技術，以「反映可能存在的邊緣群體，或來自社會生活底層的批判或另類的議程」(Silverstone, 1999：103)；從內容而言，另類媒介「為另類聲音創造了新的空間，使人們注意到特殊群體的利益，注意到反對和顛覆性的聲音。」(Silverstone, 1999：103)；再從組織模式看，約翰．唐寧 (John Downing) 指出另類媒介屬於小規模、集體運作的媒介項目，強調自我管理，表達了「想像的政治 (prefigurative politics)，嘗試在當下實踐社會主義原則，而非僅僅將它想像為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Downing, 2001：71)，這對主流媒介是有益的補充，也是媒介民主化的具體舉措。克里斯．阿頓 (Chris Atton) 在另類媒介與激進媒介方面有著廣泛著述，他出版過《另類媒介》(*Alternative Media*, 2002) 一書，在其《另類媒介的組織與生產》(*Organisation and production in alternative media*, 2003) 的論文中，以當今三個另類媒介 —— 激進刊物《對抗性資訊》(*Counter Information*)、一個行動主義的音像雜誌《潛流》(*Undercurrent*) 和一個激進互聯網項目《獨立媒介》(Indymedia) 的組織與生產，幫助我們理解不同另類媒介在實踐中的差別：《對抗性資訊》的研究強調了在對一個話題的整個生產週期中，其參與者 (記者、編輯與版面設計師) 的集體角色和多樣技能的本質；《潛流》的研究，展現了本土報導者同時身兼廣播者和技術員的雙重角色，突出了生產中某些專業方面的集中化的必要性；《獨立媒介》的研究旨在探索一個面向全球的激進互聯網項目，它可以給世界各地的行動主義者提供一個不受限制的、不受編輯制約的巨大的創造空間。作者通過具體案例分析，肯定了另類媒介能夠「為失語者發出聲音」，也就是說，它給那些發現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話語權的人以進入媒介的機會 (Atton, 2003：41–44)。

從英美學術對另類媒介豐富的研究積累來看，另類媒介擔負著促進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為終極關懷的使命，以及追求構建克服不平等的傳

播制度和傳播行為的目標。而且，去市場控制的另類媒介生產與不斷加速擴張的商業化媒介的壟斷經營相互共存。羅伯特．麥克切斯尼 (McChesney, 2004) 敏銳地批駁了美國新聞與娛樂媒體的表現本質上受制於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力量之控制，導致了作為社會公器的媒介的「公共」服務完全轉換成為由市場競爭者提供的「以成本為基礎」的服務。美國媒體之所以受企業財團之操縱且受到保護，主因是傳播政策制定機構的墮落。鑒於這樣的社會背景，英、美去商業化、去等級化的另類媒介的生產，以及逆市場、行政導向的傳播學潮流而上的批判學術研究的蓬勃展開，都為那些被壓制、被排斥群體尋求了發聲的機會和參與民主的表達。上述論題的本土化探討，對深入建構中國批判傳播理論的體系助益匪淺。

《朋友通信》的欄目分析

樣本的選取

本文所有關於《朋友通信》(紙質版本) 圖表的34個分析樣本，涵蓋2000年4月號 (No. 14) 到2006年4月號 (No. 50) 時段，其中2001年2月號 (No. 19) 和2001年4月號 (No. 20) 為「同性愛/愛滋病干預研討會暨《朋友》項目討論會文集」(合集)，故不包含於資料統計中。從《朋友》的網站上也可以瀏覽雜誌的電子版，但本文的研究以其紙質版本為標準。

封 面

從筆者所獲得的《朋友通信》的紙質版本來看，從總第22期 (2001年10月號) 開始，出於審美的考慮，封面密集的文字內容轉移至封二，封面只保留了中英文刊名、出版期數、出版時間、辦刊宗旨和「未經允許、請勿轉載」的申明，文字內容有所調整。2001年10月號以後的《朋友通信》封面是白底加淡灰色邊框，刊名是中英文雙語，刊名下面是「健康干預項目」和出版時間與總的期號，右上角標明「本項目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左下角是16字的辦刊宗旨 ——「宏揚科學、促進健康、倡導愛心、共建文

明」，在封三或是封四的位置，不斷強調「《朋友》是非賣品，不得有償轉送；歡迎索取、歡迎贊助」，並刊登相關熱線電話。但也有出於生存策略所為而取捨內容，比如2001年8月號和10月號就沒有刊登總的期數，以求避免檢查和隨之而來的麻煩。

表一　《朋友》欄目名稱及其所佔頁面比例

《朋友》欄目	《朋友》各欄目所佔頁面百分比 (共2,603頁)
1. 要訊/資訊	221.5頁 (8.51%)
2. 愛滋病性病教育	349.5頁 (13.43%)
3. 志願者在行動	49.5頁 (1.90%)
4. 愛滋病性病通信	92頁 (3.53%)
5. 專家來函	20頁 (0.77%)
6. 認識同性愛	610.5頁 (23.45%)
7. 爭鳴/百家言	72頁 (2.77%)
8. 書評	5頁 (0.19%)
9. 文藝欣賞	1.5頁 (0.06%)
10. 天下	103頁 (3.96%)
11. 人物	37.5頁 (1.44%)
12. 雜感	2頁 (0.08%)
13. 生命	712.5頁 (27.37%)
14. 讀者來信	200.5頁 (7.70%)
15. 書訊	5頁 (0.19%)
16. 鹿鳴	64頁 (2.46%)
17. 活動資訊	2頁 (0.07%)
18. 其他	48頁 (1.84%)

欄　目

從《朋友》常規的18個欄目的設置與比例來看 (如表一) ，[2]「愛滋病性病教育」位居第二個欄目，篇幅較多 (佔13.43%) ，還可以結合「要訊/資訊」(8.51%) 、「愛滋病性病通信」(3.53%) 和「專家來函」(0.77%) 三個欄目來理解「愛滋病性病教育」的全球活動，體現出《朋友》的專業特色和健康干預的分量，辦刊目的之一就是要科學地「干預和防治愛滋」。在總計2,245個頁面中，「認識同性愛」佔據了610.5頁 (佔23.45%) ，揭示出雜誌對同性戀社群議題的深切關懷，因為張北川曾告訴記者：他的研究發現 ——

「33.9%的同性愛者有過自殺的念頭，13.7%的同性愛者有自殺行為，……74.5%的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希望有一個同性伴侶」(蔡平，《中國青年報》，2002年8月28日)。張北川希望通過這一版面充分為那些在中國尚不能現身，而且遭受社會歧視與污名化的同性戀社群打破沉默，呼籲社會科學地認識「同性愛」，激勵同性戀社群正視自我的性取向。「天下」(3.96%) 與「人物」(1.44%) 兩個欄目的視野非常開闊，從世界各國有關同性婚姻立法、合法化歷程、著名人物感染愛滋或是具有同性愛取向等等方面，展示同性婚姻與愛滋問題乃是全球問題，各國因不同的法律與政策、文化傳統而會有不同的待遇，這給中國提供一些值得借鑒的對策性建議，也給予同性戀社群以鼓勵和希望。「生命」(27.37%) 和「讀者來信」(7.70%) 是《朋友》中受眾最充分參與的兩個欄目，在筆者訪談的同性戀者中，100%的被訪同性戀社群都說 —— 收到這本雜誌之後，最先打開閱讀的內容就是這鮮活地記載同性戀社群生活與心聲，而且來自同性戀者手筆、由同性戀者編輯的欄目文章。而在沒有《朋友》之前，最令同性戀社群感念、激動的讀本就是李銀河與王小波合著的《他們的世界》，被訪談者都一致感慨此書猶如「久旱逢甘霖」般震撼同性戀者的心田，有一位同性戀者告訴我，到現在他還珍藏著那本發黃的心愛讀物，鬱悶之際，仍然取出來作為心靈雞湯化解內心的愁苦。因為缺少現身傾訴的機會，分享他人/她人的情愛與人生閱歷就成為同性戀社群自己身份的一種認同和想像，從中也可獲取自我賦權的力量。「干預和防治愛滋」與公正地「認識同性愛」是項目最重要的創辦初衷，這兩項內容所佔頁面的比例最大，可見，《朋友》從抗擊愛滋切入同性戀議題是中國當代情境之下的一個策略，因為同性戀議題在當前的中國大陸，仍然還有「禁區」與被「污名」的成分，《朋友》在隱秘的櫃子世界架起的溝通橋樑，不僅是展布同性戀主體的正當性，也促進異性戀社會對愛滋病、性病、同性戀問題的認知。

由於《朋友》中「生命」和「讀者來信」的兩個欄目的稿件完全是受眾來稿，所以從其文章的主題 (已經濃縮為關鍵字) 分析表格正好折射出現實生活中同性戀社群最真實的當代問題，具體比例如圖表二所示。

從上述內容比例資料的展示中，同性戀者切身的幾個重要主題一目了然。中國社會是一個認同血親的傳統社會，性的功能是以生殖再生產

表二　《朋友》中「生命」和「讀者來信」的主題分析

《朋友》中「生命」和「讀者來信」的主題	34個樣本共464篇文章
1. 父母/其他親人	115篇 (24.78%)
2. 朋友	13篇 (2.80%)
3. 學習/工作	20篇 (4.31%)
4. 少時經歷	38篇 (8.19%)
5. 同性情感經歷	101篇 (21.77%)
6. 犯罪	17篇 (3.66%)
7. 呼喚社會理解	50篇 (10.78%)
8. 尋求真愛	30篇 (6.47%)
9. 「同性婚姻」	22篇 (4.74%)
10. 婚姻壓力	58篇 (12.50%)
11. 異性婚戀	101篇 (21.77%)
12. 輕生/出家	25篇 (5.39%)
13. 自我認同困惑	40篇 (8.62%)
14. 尋找群體認同	24篇 (5.17%)
15. 勵志	87篇 (18.75%)
16. 性濫交/性交易	34篇 (7.33%)
17. 性的安全/性病/愛滋病	19篇 (4.09%)
18.「圈子」	16篇 (3.45%)
19. 情感壓抑	51篇 (10.99%)
20. 性別角色	23篇 (4.96%)
21.「出櫃」(現身)	23篇 (4.96%)
22. 老年	5篇 (1.08%)
23.「基地」(漁場)	9篇 (1.94%)

註：樣本中的文章不論篇幅長短，凡提及列表中的任一主題內容均作為有效資料被統計。

為中心的，社會的倫理道德標準是以異性戀秩序為標準的，並且排斥同性戀者。家庭作為異性戀體系複製最重要的場域，是造成同性戀者最直接面對且無法逃避的首要環境，當中的父母會對子女相關交友行為進行監控，而且「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也是天經地義的傳宗接代目標。所以，很多文章中會提及「父母/其他親人」(24.78%)，相比之下，提及「朋友」(2.80%) 的比例就要少得多。因為家庭的緣故，「父母/親人」往往與「婚姻壓力」(12.50%)、「異性婚戀」(21.77%)、「出櫃」(4.96%) 等因素有密切的關聯。「婚姻壓力」不一定必然導致「異性婚戀」，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異性婚戀」必然是由「婚姻壓力」所導致的，不管這種壓力是來自

於家庭、社會還是同性戀本身。在接受筆者深度訪談的一位青島男同性戀者，痛苦與彷徨之際，得到張北川的面對面疏導，最終成為《朋友》項目的志願者。他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經濟獨立，工作穩定，但仍然單身未婚，他母親過世多年，與父親同住，他自己坦言：「如果母親還健在的話，一定會急迫地像過去那樣催促我成婚，母親離世之後，父親比較沉默，對婚事也管得粗疏，我也就晃了多年，感情一再受挫，異性戀情在當今社會都如此不穩定，更別說沒有婚姻約束的同性戀情，但我也不能那樣單身下去，同學、朋友聚會都成雙成對帶著孩子有說有笑，我卻形孤影單，我對這個問題已思考良久，還是覺得找個拉拉 (女同性戀的圈內稱謂) 比較妥當，彼此都是同性取向，可以互相理解，也能夠借互助婚姻與家庭的掩飾，滿足親人的期許與安全的社會身份。」這位男同性戀者的想法具有普遍性，在中國大陸異性戀家庭為核心的倫理規範與社會性別秩序之下，同性戀者往往以異性婚戀或者男女同性戀者的協議婚姻來掩蓋自己的性取向，蒙混過關，台灣的同性戀社群也有如此策略 (鄭美裏，1997) 。的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為個人經濟的自主開闢了空間，但同性戀者難以逃離傳統的社會道德賦予個人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成家立業」的家庭責任的文化自主。「出櫃」是指表明自己的性取向，也可以說是「現身」，中國大多數情況下，同性戀者是被迫對父母透露隱匿的同性戀取向；此處統計只計入主動「出櫃」的，「出櫃」的壓力來自同性戀原生家庭雙親的衝突與逼問。很多來稿討論「同性婚姻」(21.20%，即同性同居行為的合法化) 問題，這種行為在中國當前的法律規定中，暫時不可能被合法化，但相當一部分同性戀者認為自己實際上已經處於婚姻狀態，而且學界也指出 —— 通過同性婚姻的立法，才可以最大化地克服性病、抗擊愛滋、去污名化、反歧視。西方國家，如荷蘭、西班牙與加拿大等國的法律已經給予同性結婚權利。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大陸另類媒介的生產：《朋友通信》的編輯與流通模式

《朋友》是一個健康干預與科研密切結合的項目，項目負責人張北川

醫生，因其導師身為同性戀者而遭遇侮辱、迫害，出於對導師秦士德人格的景仰與醫術、醫德的敬重（大陸知識界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第一人），以及知識份子的良知，他全力為導師辯護，導師的遭際促成了張北川在同性戀問題方面的探索。同時，作為皮膚科醫生，1994–1997年所開展的性工作者研究，也使他敏銳地感受到中國性病/愛滋病的嚴重局勢，這些因素是張北川創辦《朋友》的動力源泉。

項目自治的彈性空間：《朋友》項目辦公室設在青島醫學院的一間15平米的平房內（2007年8月辦公條件得到福特基金會改善，搬遷至醫院附近的商務大樓），項目聘用的兩位非醫學專業助手（幫助處理日常事務，如電腦打字、回覆電子郵件、寫信封、接聽電話等）也在此辦公，項目組常規的志願者有十人左右，平均每年約耗資37萬元人民幣。如果項目的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朋友》項目組立即會有正面回應，實施有效的自我管理。例如，項目網站的「留言簿」在2005年1月遭遇重複黏貼無數「廣告」的惡意破壞時，張北川迅速在《朋友》（2005年4月號，第70頁）發表「張北川個人聲明」，譴責攻擊者破壞同性戀者諮詢與傾訴心聲視窗的不道德行為，並說明「留言簿」被迫關閉。

西方漢學界、中國大陸與台灣知識界在1980年代下半期開始引入市民社會理念，進而蘊含「國家」與「社會」二元對抗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論戰熱烈起來（鄧正來，1999：1–21）。其中，美國學者黃宗智別開生面，他反對將「國家」與「社會」做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而提出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當代中國的第三領域」的新論，「此一領域的內容與邏輯並不是從西方經驗中抽取的理想構造所能涵括的，它迫切地要求著我們賦予創造性的關注與研究」（黃宗智，1999：443），他敏銳地體察到「隨著國家控制的放鬆，國家幹部與單位領導之間的協商餘地也在擴大」（黃宗智，1999：442），筆者從《朋友》項目的草創與管理，的確看到伴隨中國政治、經濟的體制改革，改變了1949年至計劃經濟時代以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全面干預與控制，國家幹部與單位領導兩者之間新型的權力關係的出現，國家單位的個人可以突破由國家壟斷資源和嚴格控制私人活動空間的格局，對單位政治與資源配置的依賴性逐步弱化，獲得了新的個人發展的彈性空間。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脈絡中，原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淡出，與之相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

制也大為鬆動，非政府組織迅速在中國遞增，儘管國家既擔心西方國際社會以資金外援和推廣平等、民主與社會公正的理念來干涉、擾亂國家的基層社會，甚至顛覆政權；但同時國家迫切追求現代化的理想又渴望與西方國際社會接軌，清除威脅人類健康的毒瘤 —— 愛滋病，希望利用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技術、管理與智力來逐步解決棘手的社會問題，非政府組織與國家機器內部的縫隙、爭議與衝突或是共贏的目標與利益也展現並交織在性病/愛滋病防治的項目中，張北川的項目運作和這一背景有密切聯繫。在張北川的敘述中，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對張北川的工作沒有給予積極支持，院長與他矛盾重重，他有體制內的身份和工資，並指導研究生，但沒有獎金，也不去門診上班，代價是單位內部升遷的機遇和榮譽與之無緣，結果卻是產生了脫離單位政治的自由。單位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社會對性病/愛滋病/同性戀社群的不理解，曾經讓張北川感受到自己開展的工作與解決他所關注社群的問題的困難如愚公移山，但他敢於心態平和地正視現實，不言放棄，執著地開創了《朋友》項目，早期得到了「亞太區愛滋服務組織網絡」的項目資助與民間捐贈，以及英國Barry & Martin基金會的支持，從1998年底開始，持續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張北川援用國家幹部 (有教授職稱的皮膚科醫生) 的身份與醫學的專長，可以在不完全脫離國家單位的情況下，憑藉全球化時代海外基金的資助，以「健康干預項目」的形式把理論運用於實踐，聚焦性少數社群的社會問題，在國家機構與社會草根組織之間開闢了新的彈性空間，下文所要論述的同性戀社群的公共領域也就從這一空間積累資源，拓展而成。當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推動與嚴峻疫情的威脅下，意識到性病/愛滋病的嚴重性時，國家機構反過來主動吸收這一空間的能量，瞭解基層社會疫情。張北川教授作為第一線專家一直被邀請出席由國務院、衛生部等召開的一系列標誌性抗擊愛滋的會議，並做主題發言，他告訴筆者「應當講，從1997年《朋友》籌劃期間，我就開始得到衛生部的官方人士的支援。但自2004年以來，這種支持的力度在不斷增大。今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我與衛生部王隴德副部長坐在一起，他很明確地告訴我，對《朋友》項目的事情如有問題，可找他幫助。……福特基金會從未直接干預過我，相反，一直在積極地支持我的工作。但醫院目前對我工作的態度並無明顯改善。」(張北川回覆筆者的電子郵件，2007

年9月5日）。經過十年磨一劍的辛勤勞動，《朋友》項目獲得了國際社會與國家政府的首肯，於2007年7月17日，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向張北川頒發了「防治愛滋病傑出貢獻獎」這一政府獎項。

張北川以一種自我管理的形式，領導著一個小規模、集體運作（這也是西方另類媒介的常規形式）的健康干預項目，以《朋友》這本小雜誌來向大社會抗爭，但項目組織並不像西方某些以激進政治來凝聚反對社群的另類媒介組織，政治目標是實現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與國家管理機構形成敵對的不合作關係，《朋友》項目游離於國家機構與草根組織之間，呼籲、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接受政府委託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為政府部門制定性病愛滋病防治對策和政策法規提供諮詢和依據，彌補了政府工作的不足。而項目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機制中，也在參與實踐關於愛滋病、性病以及性少數社群的全球治理。

編輯生產：《朋友》與西方商業化的展示情色的同性戀期刊，或是台灣1996年創辦的同性戀雜誌《熱愛》（有性描述和裸體照片的性吸引）的編輯路徑完全不同，其關注的焦點是防治愛滋病/性病，以及再現同性戀社群的情感與生命悲歡，而不是國際品牌商品與性的消費指南。《朋友》封面醒目的「弘揚科學，促進健康，倡導愛心，共建文明」的辦刊宗旨，以及「本項目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文字，說明這是一本公益性的、非營利的、由海外基金支持，融科普與愛心關懷為一體的讀本。但它不是僵硬的死氣沈沈的科普說教，在雜誌的稿件編輯中，專家的建議——「愛滋病性病教育」（13.43%）、「愛滋病性病通信」（3.53%）和「專家來函」（0.77%）三個欄目（佔樣本總頁面的17.73%），就有兩個是以信函方式解決同性戀者遇到的各種各樣問題，避免了一般科普雜誌的教條化和等級化面孔，以及門診就醫的問題公開化，而是把同性戀者放在和專家平等的地位，以理解、體諒與協商的語調娓娓講述如何應對出現的情況。編輯內容的資訊源除了來自項目組專家（包括項目顧問）之外，很大程度上，內容資訊源是來自於《朋友》的收訊反饋，一種渠道是讀者直接與編輯部電話或是電子郵件聯絡，另一種是讀者寫信傾訴讀後的內心波瀾，辦公室的兩組木櫃已經存放自1988年至今的一萬餘封全國同性戀社群的「讀者來信」。這是圈內的及時心聲和最新動態，信件內容豐富多樣。項目組一開始就邀請了4位青島同性戀者參與（後來逐步增加，平均10人左右），他

們定期到辦公室整理資料、給讀者回信、打包郵件等等，以避免出現純粹專家操作的偏見。項目組還把「生命」(27.37%) 完全交給北京的同性戀志願者 (來自北京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由他們自主決策，同時，項目組把「讀者來信」(7.70%) 欄目的來信選好，交給北京的五名志願者，請他們剪裁篇幅，並潤色標題，目的在於達成參與式的互動。「志願者在行動」(1.90%) 也完全是各地志願者來稿講述活動的資訊，加上「認識同性愛」(23.45%) 欄目，同性戀者自主的頁面達到60.42%的比例。說明受眾與雜誌的聯繫非常緊密，讀者參與度超過任何主流媒介，其餘欄目的稿件除自由來稿之外，均由張北川選擇，或是邀請學界專家撰稿，或是摘取各報刊與愛滋病、一般性病以及同性戀主題相關的訊息與文章，張北川也親自動筆寫文章。編輯製作者們提倡發展和維持同性愛關係中的「健康」因素。《朋友》對情愛與性的討論，有一種去性化 (desexualization) 的傾向，雜誌絕對沒有身體廣告或是性的赤裸表現，而是正面建議如何維護健康的同性愛與同性性關係。項目組和同性戀社群之間保持著一種密切的書信或是電子郵件、電話聯繫，基層社會性少數社群的真實資訊到達了項目組，即使沒有被編輯發表，但也作為圈內資訊源儲存在張北川的資訊庫中。《朋友》項目組只給予「認識同性愛」與「生命」欄目支付稿酬，標準是每千字70元人民幣。北京志願者表示自己的工作單位身份屬於主流媒體，作為其中的一員，新聞記者的收入、活動領域與某些特權是社會地位的標籤，但在主流媒體的崗位上，卻不能公開同性戀的身份，採集本社群的媒介內容，為這個社群說話，主流媒體的改制，加諸於新聞工作者另一重經濟效益的壓力，並不鼓勵記者改變新聞審查與意識形態管制。而為《朋友》做事是沒有報酬的義務勞動，但志願者們感覺自己釋放出了真實身份的情懷與能量，體會到社會多元與媒介內容多樣性的具體意義，新聞專業主義提倡的價值目標在主流媒體難以實現，但可以轉移到另類媒介的製作中。

上述編輯特點與西方《潛流》、《對抗性資訊》有共性的一面，志願者利用了專業新聞從業者的職業優勢，在編輯《朋友》時發揮較強的專業性，主要從同性戀社群本位的角度工作，而不是像在自己的工作崗位那樣，新聞生產並沒有從某一社群本位出發的自主性，必須服從於新聞部門的意識形態規訓與層級管理秩序，因此，他們認同在項目組的編輯工

作身份是行動者，而不是具有專業技能權威的新聞從業者，強調以共用和彼此認同的集體勞動來理解平等與組織內部的民主。項目組的編輯生產有固定的人員與角色，因經費開銷有很大的限制性，故以志願者的義務勞動來節約成本和保持對社群的瞭解，在協商中控制編輯出版，反對商業化、等級化與官僚化，成員並不在意項目的規模大小與人數多寡，更多強調的是集體的抗爭目標、內部氛圍與協作行動。儘管編輯生產已經考慮到避免意見偏差，專門吸收圈內人為社群代言，但張北川的精英運作模式產生的組織和控制仍不可避免，因為還有39.58%的版面由張北川確定編輯內容和決策資訊源，而那60.42%的同性戀自主版面也受到青島項目組編輯志願者和各地志願者這樣的城市精英的資訊過濾。

流通模式：《朋友》製作、印刷完畢之後，張北川的助手開始寫信封，每一期需要郵寄3,000多個信封 (郵寄給個人) ，郵局也給予這本非營利性的內部交流雜誌充分的支持，義務上門服務，把捆好的一包包《朋友》運送到郵局郵寄 (包件有100多份) 。青島工作組常規有十位同性戀志願者在《朋友》寄出時，利用雙休日主動到辦公室幫忙，每次來時人員不完全固定 (誰哪天有空閒誰就來) ，他們當中有外企白領、研究生、軍官等，他們主要是希望通過幫助《朋友》，來幫助自身群體，他們在逼仄的項目辦公室可以分享到不加掩飾的身份認同的輕鬆與沒有歧視的平等與尊重，而回到單位，不得不藏匿身份，又成為「櫃中人」。

項目組發行《朋友》的對象包括中國大陸的近60個城市的GAY工作組；2,000位與項目組聯絡的同性戀者 (直接收到) 和1,500–2,000位從事愛滋工作、精神衛生工作的醫生和媒體人士；以及某些官方人士。各個省的數量差別很大，有的省需600–700冊，除去在省會城市外，還在約10個中等城市由當地的GAY志願者小組散發 (如河南) ，也有的省會僅20–30冊 (如拉薩) 。目前印13,000冊，郵寄之後通常剩下100–200本，會在兩期之間的兩個月內全部被索取寄出。筆者2006年6–7月田野考察獲得的資料是45個城市的GAY工作組與項目組有聯絡，時隔一年，2007年8月，張北川告訴筆者已經有近60個GAY工作組散發給所在城市的GAY人士，例如，雲南省是重災區，從2002年開始，《朋友》項目組定期郵寄200本《朋友》給雲南健康教育所，2004年以後是300本，昆明的NGO項目機構、衛生管理官員或衛生技術人員也會得到《朋友通信》(田野筆記，2006年12月

23日）。成都地區的《朋友通信》(每期200本) 主要是王曉冬負責的關愛組織在發放，[3] 一般都是在同志酒吧發放和通過朋友們的相互傳閱 (田野筆記，2007年2月3日）。另外，個別城市的精神衛生部門他們在工作中轉給求助諮詢者；一些城市的疾控部門，在開展面向GAY的工作之際，向GAY分發《朋友》。也就是說，除了與項目組保持個人性聯絡的同性戀者之外，中國大陸近60個城市的GAY工作組和部分地方疾控部門、精神衛生部門以二次傳播的方式，定期散發《朋友》到所在城市的同性戀者個人手中。項目通過志願者工作組的集體收發和《朋友》辦公室的單獨郵寄，實現這本反版權的內部交流刊物的全國流通，讓散落於各地的同性戀社群分享他們不同於主流媒介產品的資訊與價值觀。

電子媒介作為一種快速、互動的社會動員力量，其效果非凡，像美國的獨立媒介中心 (Independent Media Centres, IMC) 網路，其作為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獨立媒介網路，於1999年11月30日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反對世貿組織峰會的示威中展露風采，通過城市傳播新科技 —— 互聯網技術的激進綜合運用 (涵蓋文本、音頻、視頻與多媒體），迅速擴展到31個國家，共78個IMC，目前，傳播空間還在繼續擴大 (Atton, 2003：53）。《朋友》紙質版本的流通與電子版的網上流覽共同為項目的傳播創造了跨區域的空間，在中國互聯網快速發展的都市，點擊《朋友》電子版的比例逐年遞增，品牌效應之下，2007年8月下旬，「朋友」的域名被某網站搶註了，搶註方要求項目組每年繳費3千元方可繼續使用，出於捍衛正義與經費拮据的考慮，張北川拒絕如此要求，正在重新註冊登記。2005年11月下旬，新浪網站替張北川代建了博客，統計顯示 —— 有兩次點擊率超過9萬。筆者以為《朋友》電子版流通的技術運用還有空間可以開發，可以倡議跨地域的網路志願者主導的編輯能力和網路技術開發，項目組聯絡其他城市的志願者組織，加強電子資訊的傳播力度，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讀者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勢利用網路資源與項目互動，而把紙質版本的《朋友》份額讓位於農村讀者，這既可擴展受眾覆蓋面，產生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社會動員力量，又能夠成功地克服長期以來困擾基於印刷與流通成本的另類媒介的經濟難題。但張北川說：「《朋友》無法再開發網路空間，主要是工作太忙了，而且受到資金限制。現在大城市裏有越來越多的GAY人士通過網路閱讀，《朋友》的散發也越來越傾向於中小城市和農村。」(張北川回覆的電子

郵件，2007年9月10日）。因廣大社會的偏見、國家傳播政策的忽視、缺乏廣告的青睞、另類媒介普遍存在當下經費局促而難以持續擴展的問題，筆者調查的《同心》(成都)、《七彩天空》(昆明) 也如此。傳播新科技的日新月異與社會閱讀方式的變遷，的確給項目組提出了新問題 —— 如何跟進社會發展，既維繫城市同性戀社群的網路閱讀，又為農村讀者普及印刷版本？否則，《朋友》因缺乏互聯網技術的推進，而失去部分影響力，抗爭的力度與徹底性也受到制約。

二、構建中國大陸同性戀社群的公共領域

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內，公民是可以公開批評國家，而且公民有捍衛個人權利的能力，不過，「哈貝馬斯本人的傳播解放理論也被標明帶有社會性別化的『盲點』」(Jansen, 2002：31）。在克雷格．卡龍 (Craig Calhoun) 編輯的《哈貝馬斯與公共領域》一書中，數篇論文也批評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局限性，其指出弱勢和邊緣族群，因缺少「平等」資源，而不能自由參與公共事務，「理性」不過是排斥其他社群參與機會的理性，標準來自霸權者自己，同性戀者和婦女就被認為不具理性，無法分享布爾喬亞的公共領域，「理性、自由、平等」只是布爾喬亞的公共領域或者霸權 (Calhoun, 1991）。布魯西．羅賓斯 (Bruce Robbins) 直接把哈氏的公共領域形容為幻影，他的研究證實 —— 歷史上並未出現真正開放給全民，而且沒有支配與控制的公共領域，婦女、同性戀和其他弱勢族群自來就處在公共領域之外 (Robbins, 1993）。這些學者的理論辯難也為筆者洞察大陸同性戀社群的公共領域問題提供了啟示。但筆者試圖把哈貝馬斯特指的一個歷史範疇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寬泛的培育少數社群捍衛個人權利能力的概念，並借助上節引證的黃宗智的觀點，援用到當下中國社會的同性戀社群討論中，而不是局限於哈氏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的模式來搬用。

在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關係中，同性戀者無力抗擊或是抵制異性戀霸權話語的持久場域，誰來構建同性戀社群可見性的公共領域呢？我們都會想到社會的公器 —— 大眾媒介，但結果並不樂觀，研究者發現 —— 中國大陸關於這些議題的媒介再現顯得相對滯後。在中國，愛滋病、性

病、同性戀問題被看成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社會腫瘤，在法律、公共政策等層面缺乏積極直面問題的及時措施，而是潛在地暗示媒介掩飾上述問題的論爭和充分報導。筆者也以《人民日報》等主流媒介為例，就同性戀議題的報導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 雖然主流媒介的相關報導已經呈現客觀與科學的一面，但卻忽略同性戀社群的情感與生活體驗，鮮有正面、真實的建設性報導，而且報導量非常有限。這種媒介報導情勢與大陸黨領導下的新聞出版屬於國家掌控格局密切相關。中宣部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指令下的新聞出版的體制改革，主旨是在維護意識形態穩定的前提下，要求媒體提高效率與追逐利潤，變革作為文化事業身份的新聞出版單位為新聞出版產業的企業化經營實體，1992年以後的新聞集團化改革和1996年開始的出版集團化所產生的媒介商業化與市場化，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強勢力量貫徹於新聞出版的日常實踐。「但是，這些變化並非意味著大陸的新聞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盈利為目的，以『客觀』、『公正』和服務『主流社會』為宗旨的新聞體制。大陸的新聞改革存在著市場經濟運作與官方對新聞媒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Lee, 1994; Zhao, 1998; Yan, 2000) ；新聞改革經常出現一鬆一緊的痙攣，鐘擺式地來回於改革與收縮之間 (Chan, 1995) ，新聞媒介在經營上的自我依賴與內容製作方面的缺乏自主並存 (Chan, 1993; Yu, 1994)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20) 。大陸出版產業的改革與新聞產業的狀況相差無幾，所不同的是書刊出版還以書號和刊號的審批管理為管制形式，任何機構與個人不能任意成立出版社、雜誌社。國家的新聞出版改革並沒有考慮少數社群文化、媒介多樣性與公正性的問題，這樣的媒介生態並不利於建構和諧社會的社群共識。

與國家主流媒介對此社會問題的忽視相並存的是 —— 中國大陸愛滋病、性病與同性戀問題的嚴峻形勢 ——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每年實際新發性病例數為1,600萬–2,000萬人 (鄭靈巧，《健康報》，2004年5月18日) ；研究調查顯示中國男同性戀者的愛滋感染率約1.35% (呂福明，新華網，2004年12月1日) ；中國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聯合國愛滋病中國專題組合作完成的《中國愛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 (2004) 》的第10頁上講 —— 北京、哈爾濱、廣州、瀋陽等地男同性戀人群HIV感染率在1%以上。而張北川的調查更著重於中國男同性戀人群的

生存狀況，「我負責的十五攻關課題是2004年10月獲得批准的，2006年9月參加的驗收。總計調查了2,250例男男性接觸者，[4] 其中有200人略多自認為是異性戀者。這2,250例男男性接觸者，初篩感染率是2.4%，但確證感染率是2.2%（有數人沒有參加確證試驗）。在GBT（GAY、BI、TRANS）中，與女性有性關係的未婚組初篩感染率為3.28%，確證感染率為2.81%。已婚組初篩和確證都是1.66%。這充分顯示了愛滋病存在向一般人群傳播的潛在危險性。愛滋病在中國男同性戀人群中的感染率早已突破了1%的臨界線，而按照外國的規律，超過了1%是很難控制的。但是和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男男性接觸者中的愛滋病傳播，並不限於男同性戀本身，而是存在著向一般人群傳播的潛能。造成傳播迅速的原因則主要是社會歧視。調查顯示的同性戀社群的心理狀況更令人擔憂：「六成男同性戀者因為性取向感到很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學習或者工作。而他們痛苦的絕大部分原因來自大眾和家人的不理解以及歧視。」[5] 其實，同性戀問題並非僅僅簡單涉及同性戀者本人，按照中國當前平均每個家庭3.7人計算，那麼波及的人數就是同性戀者人數的3.7倍，這還不計算同性戀者與異性結婚後的影響人數。可見，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一方面存在與「高危人群」關聯的歧視與壓力，另一方面是還沒有得到社會接納、理解與寬容的身份隱匿。他們/她們，甚至是已經知情的親人，無不生活在密不透氣的天幕籠罩之中，儘管這個天幕隨著公正的科學知識的普及和公共政策、法律的推進以及社會意識的改變會變得脆弱不堪，但目前，天幕的密封效果依然牢固。關懷同性戀者，還是只能借愛滋的議題來切入，可以預見 —— 他們/她們最終的合法化是一個交織著被歧視、被污名、被愛滋化、去愛滋化、抗擊愛滋化的過程。

上述中國大陸主流媒介的報導現狀與具體的社會情境都不容我們繼續沉默，建構同性戀社群的公共領域顯得刻不容緩，但目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幾乎不可能准予針對性病、愛滋病或是同性戀議題的期刊獲得刊號，如何彌補主流媒介的缺失呢？在當下中國，筆者認為《朋友》這樣的另類媒介的生產不失為一個可操作的舉措，通過海外基金會的資助，以項目運作的方式，專家領銜、志願者參與、定期出版針對少數社群問題的讀物，充分實踐多種文化主義的平等理念，也能避免商業化的炒作、娛樂化的煽情，以及進入刊號管理體制化之後的權力規訓。因

此，在同性戀社群媒介嚴重缺乏和危機重重的社會情境中，面對3,000萬同性戀社群和4.7萬同性戀愛滋感染者 (這是2005年的數量，《朋友》項目組提供，各項調查表明2006–2007年愛滋感染人數持續呈現上升趨勢) ，《朋友》能夠持續凸顯同性戀者的主體性，展現同性戀的公共議題，維護同性戀者的媒介近用權，已經展現出專業人士與同性戀社群對社會主流意識的偏見和不公正進行堅持不懈的話語抗爭。專家與同性戀者的相互努力使《朋友》項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媒介影響力，及時彌補主流媒介的缺失，建構了同性戀社群的公共領域。例如，2001年8月前出版的雜誌封四有「當你讀完這份《朋友》，請把它轉送其他朋友，讓大家一同分享資訊」的文字，目的在於擴大傳閱的受眾群體，而實際上，雜誌的覆蓋面和傳閱率在短期內已經快速提升 —— 雜誌1998年2月正式創刊，1998年三月將第一和第二期一併出版，各印了3,000冊，1998年5月又出了第三期，之後，基本保持穩定的雙月刊出版，截止2006年6月已經出版了51期，印刷量從3,000冊到5,000冊，再到8,000冊，2001年達到每期10,000冊，至今 (2006年6月) 已增加到11,000冊 (2007年8月訪談的數據是已到13,000冊) ，傳閱率每冊平均6–7人。[6] 而且，在2002年4月出版的雜誌上，《朋友》的協辦單位之一已經由區域性的「泰山醫學院精神衛生室」變成全國性的「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朋友》的封二公佈了項目組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與通訊位址，封三與封底刊登全國省會與中等城市的相關熱線，《朋友》不僅為自己的受眾搭建了一個廣闊的交流平台，而且還聯絡了熱線傳播的新空間。《朋友》項目組在2000年對MSM進行了第三次調查，對前期回收的調查問卷 (n = 635) 的初步統計發現：「大約有7萬人直接獲得了有關《朋》中的資訊。其中1/4的人給異性愛者看過《朋》，並向對方公開了自己的性取向，對方50%讀《朋》後對MSM的態度變得友善了，42.6%態度無變化，僅3.7%變得疏遠了。在《朋》的MSM讀者中，75.3%認為《朋》對自己的心理健康有很大/較大促進作用，…… 66.3%認為《朋》在增強自信心方面有很大/較大幫助，24.9%有較小/一定幫助，5.2%無幫助。47.6%認為《朋》對促進個人工作質量的增高有很大/較大幫助，35.6%認為有較小/一定幫助，12.9%無幫助。」(張北川、李秀芳、胡鐵中等，2001：209) 。更為關鍵的是同性戀問題是涉及個人心身健康、家庭和諧與經濟發展、社會安全的特殊嚴重的性問題。同性戀者意識到自

己具有無法抑止的同性情欲，在沒有理性、科學地認識同性性取向之前，很容易具有一般少數族群或是社會邊緣人自恨、自責等心理情結，但如果不是同性戀者自己坦言實情，僅從外表尚不能辨識其性取向，同性戀者只能更隱匿地將壓力內化，心靈世界始終處於掙扎的困境，導致心理或生理上的壓抑狀態。目前在中國，絕大部分同性戀者被迫服從大眾社會的異性愛性價值觀而結婚，從而增加了婚姻內激烈衝突的可能性。《朋友》項目發揮了自殺危機的干預效果，其結果顯示：「樣本中35.9%因同性愛取向不能為社會理解而產生過自殺念頭但無自殺行為，《朋》使其中45.2%的自殺念頭消除了，41.2%減少了，0.9%增多了，12.7%無改善。另有9.4%既有過自殺念頭也有過自殺行為，《朋》使其中43.3%的人自殺念頭消除了，31.7%減少了，無人增多，25.0%無改善。」(張北川、李秀芳、胡鐵中等，2001：209) 可見，《朋友》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強勢與弱勢的對立，相當於部分地克服了社會的反對力量和弱勢社群的自殺危機。

筆者在成都與昆明的田野考察中，從性病/愛滋病防治或者同性戀社群的相關國家機構與草根組織的反饋資訊顯示 ——《朋友》項目對帶動大陸同性戀公共領域的建構起到了引領作用。雲南健康教育所是雲南重要的性病愛滋病防治官方機構之一，負責過2000–2006年中英性病愛滋病防治合作等重要項目。筆者2006年12月對項目辦公室主任王明醫生進行了深度訪談，王明談到《朋友》項目給予他們工作切實的幫助，「一方面張北川教授大力支持我們在同性戀社群中的干預技術、機構倡導、資訊與資料共用，如中英項目起步之初，我們與男男性接觸 (MSM) 的群體沒有任何聯繫，張老師以《朋友》項目的方式從1990年代末期就在全國建立了同性戀社群的聯繫網路，在互聯網使用尚不充分的地區，就以通信方式解答諮詢者的問題，是張老師積極和昆明的30餘位男男性接觸者通信聯絡，並利用2002年6月他出席昆明會議的機會，幫助我們與昆明的男男性接觸者見面，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了志願者隊伍，我們的工作才得以順利展開，這之後，《朋友》多次舉辦男男性接觸干預的培訓班，都邀請我們與志願者共同參與。」(田野筆記，2006年12月23日）。2004年5月雲南健康教育所在國際愛滋病聯盟資助下，創刊雲南同性戀社區第一本刊物《七彩天空》，張北川是顧問之一，筆者2006年12月在昆明調查時，這份雜誌共出版了5期，這是2003年以來繼北京紀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出版《分享

與交流》、成都同志關愛工作小組出版《同心》之後的又一本主要面向同性戀社區的刊物。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張北川老師的支持，負責人王曉冬充滿感念地告訴筆者：「2002年張老師親自參加成都同志社區愛滋病綜合干預項目 (屬於四川省2000–2006年中英項目) 的啟動會……2004年的時候，當時關愛組織的生存遇到困難，我想放棄做這件事情，我也給張老師打了電話，是他勉勵我說同志群體需要有人來做這項工作，鼓勵我要看到希望和前景，勸我不要放棄，在很多場合對我們的工作都給予肯定。從2002年5月介入這個工作以來，《朋友》我每期都讀，再忙碌也如此，雜誌使我的內心得到慰籍，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的身份。互聯網的發達使現在同志能多渠道得到資訊，但還是可以從《朋友》知道更多的專家學者觀點和國際國內的關於同志社區和愛滋病防治的工作情況。」(田野筆記，2007年2月3日) 。其實，《朋友》項目組對大陸各省市的愛滋、同性戀關愛組織的協助不勝枚舉，《朋友》項目作為中國同性戀社群可見性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其持續的穩健發展鼓舞著同性戀社群彙聚各種力量，一步一步爭取權利，儘管這一旅程充滿曲折、艱辛與挫折，但全國湧現的國家相關機構與草根組織的數量和規模已經遍佈省會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已經在大陸形成一個聯盟式的同性戀社群交流的公共空間 (田野筆記，2007年2月3日) 。

當然，這個公共空間的誕生是在愛滋病、性病作為人類健康的「安全隱患」，必須加以防治的語境中建構，介入雜誌編輯製作與流通的專家和志願者都是同性戀社群的精英，也是同性戀運動的行動主義者，但專家所代表的精英階層並不能代替整個同性戀社群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全面發掘，從健康干預的角度，讀者已經分享了《朋友》如何使他們找到生活的歸宿感以及自己需要的特殊資訊。但因為專家的組織與運作往往不能脫離自身知識結構與關注目標的限制，公共空間也存在某些缺失。其一，《朋友》項目與整個中國的愛滋病情現狀相比，其力量顯然過於薄弱，覆蓋面也很有限，尤其是身處農村的同性戀者還無法及時分享這樣的資訊。其二，《朋友》項目對女同議題的相對忽視，就男同性戀者而言，他們因愛滋干預而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女同性戀者 (拉拉) 因性行為距離愛滋感染較遠，以及社會對婦女生殖再生產和倫理身份的苛刻要求，所以女同性戀者的發聲還是異常微弱的，這是一個普遍性問題。同

時，「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話語的核心問題聚焦於啟蒙異性戀婦女反對父權制 (heteropatriarchy)，從婚姻、家庭、就業、教育、參政等層面爭取兩性平等，忽略了中國婦女內部 (同性戀婦女與異性戀婦女) 的差異，同時，中國的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戀者之間相互隔膜，難以形成合力實踐抗爭目標，導致女同性戀議題 (lesbians' issues) 的討論非常薄弱」(曹晉、曹茂，2007)。目前看來，僅僅李銀河教授有充實的學術論述與案例調查。從34個《朋友》樣本的「生命」與「讀者來信」兩個欄目來看，如果把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者的再現作為分析指標，得到的資料顯示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者在《朋友》中再現的比例嚴重失衡。「生命」欄目共280篇文章，其中有166篇來稿是論述男同性戀者生活的，佔59.29%；僅有36篇是關於女同性戀者的，佔12.86%。「讀者來信」欄目共196篇文章，110篇來信出自男同性戀者之手，佔56.12%；女同性戀者來信僅僅12篇，佔6.12%。那些以婚姻或其他方式隱蔽身份的、從未現身的女同性戀者，儘管她們的人數少於男同性戀者，但不等於這個群體不存在，她們或許在整個婦女的衣櫃中掙扎，或許在異性婚姻之內忍受性強暴，張北川也感覺非常遺憾，因為自己的研究傾向和雜誌版面所限，對女同性戀的議題探索並不充分。

成都、昆明的一部分《朋友》讀者認為：《朋友通信》從同志人群本身的視角展現人群真實的生活、情感、社區狀況以及表達同志的觀點的內容還是不夠，而專家學者和一些同志愛滋病防治工作組的聲音比較有支配性地位。雲南健康教育所王明也在實踐中體會到上述意見：「我也深感困惑，主要來自我們與同性戀社群內部的意見不一致，我們工作的目的可能與社群的真正需求還有差距，我們也無力解決社群的所有問題，同性戀社群容易將愛滋病防治與社群發展兩者的重心互換，以社群發展為旗幟而更多地開展一些娛樂性的工作，而沒有將真正意義的社群發展和愛滋病防治放在首要位置，現在，雲南已經成立眾多的關愛小組，但彼此間的力量並沒有充分整合」(田野筆記，2006年12月23日)。筆者以為讀者的心聲應該提醒國家高度重視這一社會問題，政府決策部門如何落實傳播政策多元化的措施，允許創辦為少數社群服務的文藝類媒介，而不是苛責《朋友》項目或是防治機構滿足這類訴求，因為雜誌的篇幅和項目工作重心與同性戀社群普遍的情感生命體驗的日常需要存在距離。

主流媒介為提高效率、追逐利潤而徹底市場化、集團化的體制改革，其任務就是生產內容和有消費能力的目標受眾，每一個流程都具有商品化特徵，廣告是其最具商品化特質的支援機制，媒介、受眾與廣告商處於一種相互制約的商品化關係之中，媒介組織對商業利潤的全面追逐和社會主流意識的偏見已經壓制並排擠了弱勢群體的聲音。與此同時，另類媒介在中國大陸通過海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逐步發展起來，這既是同性戀社群對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文化關係的抗爭與挑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主流媒介隱蔽充滿矛盾與鬥爭的現實生活，忽視少數社群利益與重大社會問題的及時補救。《朋友》尊重同性戀者的差異認同，保證同性戀者的傳播權利，從而激勵同性戀社群克服社會生活的壓迫力量，為弱勢群體尋找抗爭與免受歧視、壓制的對策。在這樣的意義上，《朋友》項目還是一種同性戀者的語藝運動，「語藝的目的是說服，其運作深具政治意涵，它是促成社會變遷的重要樞紐」(吳素柔，1996) 。不過，筆者以為其最直接的效果則是避免公開的個人「現身」，「作為向異性戀社會積極發言的方式，在顧全『個人匿名性』的情況下進行積極的集體現身」(簡家欣，1998：90) 。這迥異於西方社會同性戀社群為爭取平權的「個人現身」的示威遊行，在當前的大陸社會也許更具策略性。通過對媒介生產過程的寬廣路徑的關注，另類媒介的實踐凸顯出主流媒介的局限性。中國大陸9,000種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刊號的期刊中，沒有一本雜誌是專門針對同性戀社群的非消費性需求。而多種文化主義呈現在傳播方面的一個核心主旨，就是要讓弱勢群體獲得媒介近用權和得到媒介的非歧視再現，筆者以為中國另類媒介的生產實踐是對主流媒介議題缺失與商業化壟斷的有效補充，其突破了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狹隘論述，展現了體制外的、具有多種文化主義平等精神的21世紀現代中國非主流媒介圖景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呂福明 (2004年12月1日)。〈中國首次公佈男同性戀人數及感染HIV病毒情況〉。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2/01/content_2280169.htm。

李銀河 (2003) 。《酷兒理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李銀河、王小波 (1992) 。《他們的世界 —— 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哈貝馬斯 (1999)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 。上海：學林出版社。(原書Habermas, J. [1990]. 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吳素柔 (1996年7月) 。《壓迫與反抗：台灣同性戀社群團體出版品的語藝分析》。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美苓 (2001) 。《愛滋病與媒體》。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曹晉、曹茂 (2007年12月) 。〈邊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熱線研究〉，「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五屆 (2007) 學術年會青年學者專場」論文，上海。

張北川、李秀芳、胡鐵中等 (2001) 。〈《朋友通信》—— 對男男性接觸者的愛滋病干預項目〉。《中國健康教育》，第17卷，第4期，頁206–210。

黃宗智 (1999) 。〈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 —— 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域〉。鄧正來 (等編) (1999) ，《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頁420–443)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鄭美裏 (1997) 。《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鄧正來 (1999) 。〈導論：國家與市民社會 —— 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鄧正來 (等編) (1999) 。《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頁1–21)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蔡平 (2002年8月28日) 。〈最有勇氣的人〉。《中國青年報》，第9版。

簡家欣 (1998) 。〈九○年代台灣女同性戀社群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在刊物網路上形成的女同性戀新社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頁63–115 。

鄭靈巧 (2005年5月18日) 。〈性病發病形勢嚴峻〉。《健康報》，第3版。

羅文輝、陳韜文等 (2004) 。《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頁20)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Sage.

Atton, C. (2003). Organisation and production in alternative media. In S. Cottle (Ed.), *Media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pp. 41–55). London: Sage.

Calhoun, C. (Ed.) (1991).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hristopher, H. (1998). Homosexual demography.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5*, 390–421.

Curran, J. (1997). The Struggle for a Free Press. In J. Curran & J. Seaton (Eds.),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p. 15). London: Routledge.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Organization: Two Models. In S. C. Jansen (2003).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 71). London: Sage.

Erni, J. N., & Spires, A. (2001). Glossy subjects: G & L magazine and "Tongzhi" cultural visibility in Taiwan. *Sexuality*, *4*(1), 25–49.

Habermas, J.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MA: Beacon.

Habermas, J.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Special Issue on Modernism (Winter)*, 22, 3–14.

Hamilton, J., & Atton, C. (2001). Theorizing Anglo-American alternative media: Toward a contextual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US and UK scholarship. *Media History*, *7*(2), 119–135.

Herman, E. S., & McChesney, R. W.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Cassell Academic.

Jansen, S. C. (1993). Future will not be the vision of past.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 Media, Gender, and Technology* (p. 3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cChesney, R. W.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iles, M., & Huberman, K. (198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London: Sage.

Moritz, M. (1989). American television discovering gay wome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programming decisions at the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3*(2), 62–79.

Robbins, B.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Silverstone, R. (1999). Community. In *Why study the media?* (p. 103). London: Sage.

Williams, R. (1980).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means of production. In R. Williams (Ed.),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pp. 50–63). London: Verso.

van Zoonen, L. (1994). Quality.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p. 146). London: Sage.

註 釋

1. 這些資料是筆者在張北川教授辦公室訪談時所獲得的資料。在此，深謝張北川教授對本研究的支援，筆者從他的辦公室得到《朋友通信》的樣本，以及一系列切實的幫助。張北川把「同性戀」稱為「同性愛」，但筆者的正文敘述統一使用「同性戀」作為身份的稱謂。
2. 「其他」是指「朋友捐贈榜」、啟事、聲明等不屬於任何欄目的內容或資訊。《安全性行為指南》自2001年8月號開始作為歸屬於「愛滋病性病教育」欄目的

固定內容刊登，基本每期都有，內容完全相同，後作為獨立欄目列出，但在統計時仍將其計入「愛滋病性病教育」欄目的內容。 2003年2月號起，刊物進行了比較大的改版。「要訊」欄目名稱改為「資訊」，頁數增加為78頁，「生命」欄目每期均圍繞一個主題刊登內容，該主題同時作為欄目的副題，格式為「生命」。「爭鳴」欄目和「百家言」欄目的內容性質相似，且從未同時出現過，因此認為兩者為同一欄目。「鹿鳴」為交友性質欄目，根據2001年12月號的啟事，自該期起改為單張印發，不在刊物上登載，2004年2月號恢復這一欄目。

3. 2002年6月面向本地同志人群的社區非政府組織—成都同志關愛小組成立，2002年6月開設成都同志關愛熱線，2002年–2005年持續開展熱線諮詢工作，2003年12月，關愛小組創辦了全國第一本同志社區讀物《同心》，又於2004年7月正式註冊成立成都同樂健康諮詢中心替代關愛小組，這是以公司性質註冊而得到合法身份的民間自發的關愛機構，一方面公司存在經營風險和稅收壓力，但另一方面反應出中國草根社會組織抗爭所具有的彈性空間與公民自覺意識。該組織以「合作、參與、思考、行動」為同志社區應對今日社會諸種挑戰的最佳策略；以「增權」理念為指導，致力於同志文化健康發展，關注同志生存狀況，與政府合作進行愛滋病防治工作。在訪談中，成都地區的同性戀者習慣以「同志」作為身份的稱謂。
4. 男男性接觸者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又譯為男同性性接觸者或與男人有性關係的男人。其主體是男性同性愛者 (或稱同性戀者)，其次是男性雙性愛者 (或稱雙性戀者)。男男性接觸者，特別是其中的男同性戀者，容易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工業化國家對男男性接觸者的愛滋病干預主要靠同性愛社團等非政府組織。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成本 —— 效益比高，但需要有相應的經濟文化框架作支持。發展中國家普遍忽視對此領域的愛滋病干預。張北川的研究與行動聚焦於對這部分人群進行愛滋病干預。
5. 這些數據是筆者2006年6月在張北川教授辦公室訪談所獲得的資料。2006年1月24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UNAIDS、WHO聯合出版的《2005年中國愛滋病疫情與防治工作進展》，其中專門提及 ——「MSM中HIV感染者和病人約4.7萬人，佔評估總數的7.3%。」張北川教授告訴筆者還可以通過搜索UNAIDS的網站www.unaids.org, www.unchina.org/unaids或中國大陸CDC的網站www.chinaids.org.cn也可以查閱相關資料。
6. 2006年6月在張北川《朋友》項目辦公室獲得的資料。

鳴 謝

本論文是2006年「復旦大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創新基地數字傳播與新聞出版專業建設研究項目」的系列成果之一，非常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珍貴意見。本文修改自2006年「深圳傳播學論壇」的會議論文。